



## 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时间：2004-9-7 8:38:30 来源：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 作者：包弼德(美国哈佛大学) 阅读1459次

(本篇承张邦炜先生提供)

众所周知，历史自己不会讲述。我们阐释过去，说它意味着什么，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所幸过去就是过去，我们对它做什么，

它都不会反对，就像将来的人如何阐释我们，我们也无法反对。我们也知道自己的阐释时微时巨地变化着，而阐释中的变化与阐释者所处的思想

想(intellectual)世界是相关的。如果说我们阐释过去的方式是由当前的政治所决定，或者说一种特定的阐释方式逐渐流行是因为它满足了当前某些群体的兴趣，这样说都太简单了，因为有时一个理解过去的新的方式，改变了当代的阐释者在做阐释时所处的思想、政治世界。

阐释不会轻易改变，而且很少发生巨变。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阐释和阐释之间总是千差万别，没有共同接受的阐释框架，那么研究过去

就很困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意义。对过去的阐释总希望人人接受，但是，一旦人人都接受了它们，它们就经常被想当然地认为的确如此

，不再受到置疑。这样我们就自然不必去询问有些事为什么以它所发生的那种方式发生，而是要把我们的时间花在说明它“如何”发生上。我

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更大的阐释，是我们的生活所依靠的，它们教我们如何解难释惑，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我重申一下我的立场：我发现

这是事物的一个正常状态，比起让思想者老是从根子上去挑战人人认可的价值观，这个状态更好一些。

历史学家承认，国家的价值观在历史的某些时期被重新界定，比如当社会发生变化、对财富的控制发生转移、政治权力重新组织。这些划

时代的变化在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上都发生过，而且肯定会再度发生。历史学家还会承认，过去的人们为了使他们的历史更有意义而采取的阐释

主题，与阐释者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完全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阐释主题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当代”的史学家者经常会使用像“科

学的”、“客观的”学术，或者仅仅是“职业化的”学术这样的观念，来显示我们理解历史的方式独立于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时代。而我认

为，

不管历史学家的职业化多么深，他们多么忠实于客观性、真实性和信服证据，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真的独立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

。大概我们最需要做的，是能够认识那些潮流，以及它们对我们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愿意对它们保持审慎，并提出挑战。如果我们历史学家

把工作中须臾不离的对过去的阐释，与我们当前社会和社会组织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那么对阐释过去的那些主题进行挑战，就意味着质疑当

前的价值观。而这当然是很难的。最有吸引力的(compelling)分析结构很难被挑战，因为它们提供了大规模的阐释，以令人信服的、前后一致

的方式把互不相干的领域组成一体，并且证明那些采用这种分析结构的人的存在和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那些对“世

界运行之道”的想法提出挑战的人，由于他们把自己置于现成的意义框架之外，因而他们的意见会被认为是不着边际和无关紧要的。

以上是从一个很大的视角来引入一个小例子。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描述一下我们很多人在阐释唐宋转型时所共同采用的框架是如何变化的

。我将主要谈美国的学术(尽管我相信我要说的很多内容也同样适用于日本和欧洲的学术)，但是我还要指出，对中国历史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

，我们理解方式上的转变也反应了美国思想文化的转变。

在美国，对宋代的研究吸引了很多学者，因为宋代被普遍看作中国历史上一个转型期。这促使宋史研究者去询问宋代如何与之前和之后的

历史阶段相联系，宋代如何使“中叶史”(\*这里根据作者的建议，将“middle—period”译为“中叶”，是指八世纪中期到十六世纪中期这一

段历史，与下文出现的“medieval socicty”不同，后者译为“中世”，指东汉到五代这一历史时期，日本学者普遍将中国史分为“古代”、

“中世”、“近世”三段，具体起讫有不同的说法，作者在本文对“中世”的界定主要采用内藤湖南等人的分期意见。——中译者注)变成中国

历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①那些着手从事宋史研究的史学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打算集中精力来说明宋代何以不同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

期，还是打算在宋代与其后的时代之间建立联系。正像一个日本历史学家向我指出的：在宋史研究中，我们是在唯宋主义者和明清主义者之间

做选择。在我看来，美国宋代研究的奠基者the late Edward Krackc, Jr.，刘子健(James T. C. Liu)以及Robert Hartwell，他们都在著作

中谈到宋代如何与中国历史的其它时期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明清主义者。

在最近的十年中，我们关于中国“中叶史”(middle-period)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为了理解这个变化何以是根本的，了解一些最

初的理解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承认，在美国最有影响的中国历史分期论，主张宋朝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之近世的开端。这个观点最早由京都大

学的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后来日本出现了另一种看法，它出自东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它看来，宋代是封建制的中期。这个观点

由周藤吉之的著作提出，在仁井田陞的法律研究中得到发展。②这第二个学派在美国的宋史研究中并没有居于主流，尽管它宣称十六世纪是真

正的转折点，但它的确影响了研究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史学家。③

尽管它们彼此迥异，但是京都和东京的中国历史分期论主张，有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第一，他们把历史的变化理解为朝向“现代性”的

不同阶段。第二，他们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换句话说，这两个

学派都持有一个历史的目的论观点，认为历史的终点就是现代性的实现，这种现代性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尽管两种分期论一种是资本主义和官

僚制的，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提出这些观点的学者希望它们具有政治的含义。的确，公平地讲，两种分期论都涉及现代性的政治、

殖民主义和文化转变。④内藤的假说使宋代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并且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教科书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这

是一套完整的视界，它把政治制度和行为、社会结构、经济过程，以及文化中的变化综合在一起，而且它既能适用于中国历史，也能适用于地

中海文明，因而是普遍的。但它还是目的论的，因为它假定文明能够，而且应该朝向“现代性”自然地成熟，从这一点讲，它也是一种信念，

因为我们当然不能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

在我看来，近些年出现了两个变化。首先，一代新的历史学家对唐宋转型逐渐提出一幅新的图景，它颠覆了内藤假说中一些最重要的组成

内容。我在下文将更仔细地分析这一新的看法。与此同时，更年轻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受到汇聚在后现代标帜下的思潮的影响，这一思潮至

少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就通过学术生活而流播。在我看来，后现代思潮的流播，其最重要的后果就是迫使我们把历史理论当作某一时间和地

域的思想构造来检讨，并且使学术有可能拒绝一种目的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围绕“现代性”的观念构造历史，它把“现代性”作为人类演进的

自然阶段。如果我们不相信历史的变化必然是由一个个后胜于今的阶段所组成，就没有理由一开始就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应该把中国历史的任何

转型，包括唐宋转型，理解为朝向一个特定时期的发展阶段，这个特定时期就是欧美历史上被定义为现代的那个时期。⑤

关于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把历史仅仅视为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种寻求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的职业，已经有很多的讨论，或者赞成，或

者反对。但至少这使历史学家更多地思考一下，那些文学和思想传统中典型的构造和阐释过程，是如何普及于社会、政治生活，如何普及于他

们的学术之中。研究文学和思想的学者也逐渐意识到文学、思想传统中的创造、再生和转化，和认可它们、发挥它们的社会、政治过程、结构

完整地联系在一起。⑥

在历史阐释的目的论框架中，现代性标志着历史的积累过程，对这个框架的批评显然适合了一些当代史学著作愈益浓厚的后现代趣味，尤

其是在社会、文化和思想历史方面。不论怎么讲，那些首先对内藤学说发难的人是对理论问题感兴趣。⑦我这一代对唐宋转型和宋史感兴趣，

大概起初都是由于这一时期被说成是现代性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发展，而对现代性之目的论挑战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思想辩护 (justification)。

### 传统的阐释

我现在要讨论我们理解唐宋转型的方式的转变。从内藤假说可以引申出，宋代标志了现代性的开端，这是对唐宋转型的“普遍接受” (received) 的看法，我将首先简要描述这个看法的四个方面。

在社会史方面，唐代结束了世袭门阀对政府的支配，宋代开始了一个现代的时代，它以平民的兴起为标志。在教育的基础上，通过考试，

而不是按照出身来选拔平民为官，这样的文官考试体制，促使在唯才是举的基础上建立的高水平社会流动制度化。在宋代，跻身仕途的平民取

代了门阀家族，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是官员和退休官员的主体，称为士大夫。宋代对科举制的改革使它变得更加公平(例如，糊名制的采

用)。学校教育普及到县，保证了地方士人参加科举。人们能够通过受教育和应考获得仕途成功，这事实上意味着，所有能够受教育的人都是政

治上有前途的参与者。宋代政府对地方教育的支持是前代所无法相比的，它以此来鼓励这种发展。

第二，在经济史中，唐宋转型是以经济秩序的根本变化为标志的。政府对商业失去了控制。到宋代，商业对国家的财政政策至关重要，政

府稳步提高货币的供给。在十一世纪，商业税和国家专卖商品的销售收入，在国家的岁入中占的比例，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点。唐代由国

家重新分配土地的均田制，被私人土地市场所取代；而根据土地和财产一年两次征税的两税法，取代了按人头收税的租庸调制。由于南方的开

发和新稻种的引进，农业产量增长了。这些发展使非士族家族私人财富的积累得到承认和合法化。日益增长的私人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前所未有的

的城市化。京城从一个人为的行政产物变成了同时也是商业中心。

第三，在文化史上，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宫廷文化让位于

通俗的娱乐文化。科举制的扩展鼓励那些新富起来的人在教育上多投资，从而对教师和书籍的需求增长了。而新的印刷技术被应用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科举落第者成为教师，甚至远远超出所需，这些都满足了对书籍和教师的需求。根据检验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考试制度来选拔政

治精英，这与私人财富的稳步积累，以及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心的日益增多结合在一起，促使一种国家文学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为更多的人所

易于接受(因此带来了从雕琢向平易文风的转变以及词、戏剧、说书和小说的兴起)，它支持对公共生活更活跃的参与(因此从佛道的退避转向儒

家的复兴)，它证明平民兴起、掌权是合理的(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理性的形上学，支持人人皆可学以成圣的观念)。宋代的儒家引进佛教哲学更

复杂的观念，为儒家的社会伦理提供更充分的基础，以此来对治佛教对儒家的挑战。

第四，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

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了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

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

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

在我看来，宋代标志着独裁的增长，这在内藤对唐宋转型的阐释中是核心内容，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事实上没有实现现代化。宋代以

后中华帝国体制的独裁，解释了为什么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没有持续按照一种走向现代性的方式发展，这种现代性就像西欧和美国的

历史所界定的那样。与此同时，独裁应该受到谴责的观念为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提供了一个办法：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而

让别的国家来指导中国也是必要的。⑧

这是对唐宋转型过于简约的叙述，它也忽略了几部更近期的著作，这些著作仍然首先关注为什么中国没有照欧洲的意义走向现代化。⑨但

是表明我如下看法或许就足够了：关于唐宋转型的阐释，是以历史的目的论观点为基础的。事实上它指出中国早在我们之前就实现了我们当代

西方人所重视的东西。这使得宋史研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很重要，它按照当代西方的眼光来使中国的过去变得有意义，并且从一个当代的视

角来看，它为证明中国并非落后、停滞和无意义提供了佐证。

注释

---

① 美国编写中国历史，只在某些时候才把对重要的历史转型的重新概括放在核心的位置。而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研究宋史的人数迅速增加，与

此同时，对唐宋转型和南北宋转型问题的争论也在不断进行，现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之前最活跃的历史研究领域之一。由James Hargett所主编

的《宋元研究学报》(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其最近几期显示了“宋代研究”领域在美国的强盛, 以及它的国际性。在最近的几年

里, 从宋史研究人手的史学家开始超越朝代的界限, 以期把十一和十二世纪的发展与十六世纪的类似现象联系在一起。这种超越朝代界限研究

历史的愿望, 促使我提出, 现在的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中叶”, 而不单单是宋代, 更感兴趣。

② 内藤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甚至更早。傅佛果在《政治与中国学: 内藤湖南(1866—1934年)之个案》第168—210页 (Joshua A

.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 Cambridge, Mass. :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对内藤关于唐宋转型的描述做了历史的讨论。通过宫崎市定的作品, 这些观点被建成一个主要的分析框架, 特别是

在宫崎1950年的著作《东洋的近世》中。宫川尚志清楚地谈到宫崎在树立内藤的立场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概述内藤假说及其对日本中国研究的

影响》[“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远东季刊》 [Far Eastern

Quarterly] 第14卷第4期(1955), 第533—552页。马克思主义的分期论最早由前田直典在1948年勾勒出, 他1949年去世, 此后由石母田正加以

发展。石母依据了周藤对宋元土地所有权的研究。寺地遵在《日本宋史研究的基调》, 见《中国历史研究》第1卷(1991), 第191—210页中描述

了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政治态度。“近世”今天一般被译为“现代早期”(early modern), 但是宫崎在1955年用英语著述的时候是用的“现代”

(modern), 这得到了宫川的赞同, 它显然反应了最初的想法。

③ Linda Grove 和Christopher Daniel在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 Qing social Economic

History(《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日本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论述》,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社, 1984年)一书中翻译了“东京学派”关于中华帝国

晚期历史的一些主要的论述。还请注意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Mark Elvin, The Patterns of Chinese Past), 它介绍了东京学派社会经

济史的主要内容, 但自己有一个分期论的主题。Denis C. Twitchett关于唐宋社会经济史的许多作品介绍说, 东京学派实际上并未维护它的历

史分期论。

④ 内藤和前田的解释为什么在日本和美国得到如此多的赞同, 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对于欧洲历史的一个特定的理解, 转化为进步的普遍道路。

在日本它鼓励了那些呼唤改革的人, 以及那些身处国外, 相信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应该向欧美的权力妥协的人。此外, 按照寺地遵的说法, 对

一些日本学者来讲, 在二战之后表明中国历史并非停滞是很重要的(内藤看起来是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社会鲜有变化), 由此反对日本的侵略。然

而，在战前，认为东亚不需要依赖西方就可以走向现代化的观念，是为那些希望用来指导当代日本人的政治理想服务。寺地遵指出，并非所有

的学者都把历史和他们自己的政见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右翼分子加藤繁就试图避免让中国史去适应自己的政见(他是否完全成功地做

到是另一个问题，加藤认可“大国家”这种观念，并且用大部分时间研究中国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其他人承认，现代性是由西方来界定，因

此得出结论说，除非欧洲人来，否则现代化的时代是不会开始的。松井等人于1930年所著的《东洋史概说》就是一个例子，宫川尚志的著作第

547页提到它。

⑤ 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特点不能被仿效。我们从历史中得知，传播在发生，而且学习和模仿对传播是必要的。否认

历史的进步是必然的，就是说：(1)界定“进步”这样一种特定的变化，就是对我们赋予那种变化的价值所做的判断，而不是变化本身的一个特

点；(2)如果不是自觉地去选择进行某种变化，国家自身不会变得相同。根据这个看法，所谓的“现代”，是对一个特定的历史形势的描述，因

此也就是一个思想建构(construction)。

⑥ 中国研究之外的思想史已经不再试图去寻找一个民族的基本个性，并用“进步”这样的概念来判断他们。也有人批评用一些共同认可的观点

来界定一个时期和一个民族，无论这些共同认可的观点是高级文化的“精神”，抑或想当然的思想假定，还是指一个民族或阶级的“心态”。

请见Maurice Mandelbaum在《观念史、思想史和哲学史》(“The History of Ideas,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一文中，对Arthur O. Lovejoy《存在的大链条：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1964)的批评，Maurice的文章见于《历史与理论增刊》(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第5卷

(1965)，第33—66页。Peter Burke在《精神史的优势与劣势》(“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对此做出辩护，它

也注意到心态(mentalities)的问题，此文见于《欧洲观念史》第7卷第5期(1986)，第439—452页。Roger Chartier在《社会文化史的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ociocultural History”)中不是单纯停留在批评，而是为思想史和社会史勾画了另一种道路(course)，这篇文章

见于Dominick LaCapra和Steven Kaplan主编的《当代欧洲思想史》(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13—46页。用哲学的方法来对待历史上的观念，以及把它们从具体的环境中抽象出来，对这种做法的不安，促使Quentin

Skinner和其他人呼吁一种严格的环境论(contextualism)，例如，见他的《观念史中的意义和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见《历史和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8卷第1期(1969)，第3—53页。在我看来，这种环境论，即使只是一种纯粹的

说法，也促使我们关注思想文化中的不一致和断裂，以及那些鼓励了多样化和争论的再生和转化过程，使我们避免在界定“儒家思想”或“宋

代思想”的工作中内在具有的简缩(reductionism)，坐实(reifications)和简单化(simplifications)。另一方面，这种环境论，在理解文献时

首先重视权威的意图，人们抨击它不能认识到复杂的思想工作的解释上的开放性。关于这个看法，见例如Dominick LaCapra《反思思想史及

阅读文选》(“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Reading Texts”)，此文见于Dominick LaCapra和Steven Kaplan主编的《当代欧洲思想史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47—85页。这场争论最初是由David Harlan在《思想史及文学的回归》(“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Return of Literature”)中提出，此文见于《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4卷(1989年7月)，第581—609页

；Hollinger, David A. 在《浪子回头：历史认识持续有效》(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The Persistence of Historical Knowing)第

609—622页中做出回应；Russell Jacoby在《新的思想史?》(“A New Intellectual History?”)中第二个做回应。Dominic LaCapra在《思想史

及其道路》(“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Its Ways”)中对回应做出回复，此文见于《美国历史评论》第97卷(1992)，第405—439页。概括地讲

，注重环境的趋向，对哲学和“进步”的阐释主题提出挑战，是希望更历史地看待问题。在Harlan看来，文学的挑战是要恢复一个更古老的、

更具解释性的风格，“与古人就我们重视的事情进行交谈”。在我看来，我们永远可以用思想的文献来反映我们重视的事情；而这并不能解释

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转变。关于这个主题，还可以提到很多文章。与其把越来越多的文学著作当作一个新方法的来源，不如我们把当代思想史中

这些发展当作一面镜子，来观察中国从宋代到明代的思想文化(而且，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中国的过去当作观察我们的现在的一面镜子)。

⑦ 然而请注意，这一时期重要的社会史家Robert M. Hartwig也在思想史领域发表了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中国十一、十二世纪的以史为鉴、公共

政策和社会科学》(“Historical Analogism,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Science in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 China”)，此文见于

《美国历史评论》1971年，第690—727页。下文将要讨论的Robert Hymes的著作、伊霏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作品，都在思想史、文

化史和社会史之间讲行空义研究。

⑧ 内藤从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贵族政治体制将成为日本现代化的障碍；这个对日本的殷鉴，看起来内藤在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时



候就系之于心。

## 新的阐释

有关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其问题是，在某些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因此它会阻碍人们理解宋代对于中国史的历史重要性。自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中叶史”(middle-period)的史学家的著作，总起来提出了一个新的阐释。

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

”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在中世社会里(medieval society)，大多数“门阀”人物坚持

说他们的地位来自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文化，这一点推进了唐代以及更早时期的世家大族的消失。这使得其他人相信他们能够分享那种文化，

靠文学写作展示他们的成就；通过考察文学技能的考试来赢得公众的承认和出仕的权利。<sup>⑩</sup>回顾当时，显然“世家大族”本身就是一个观念——

——一个靠政治制度和社会的认可来维持的社会构成(construction)——而在唐代衰亡之前，这种观念在社会上已经不太能够付诸实现了。

(11)在

九、十世纪，中央王朝的权力受到侵夺，这加速了那些支配着地方军事和经济的家族的崛起，使得“世家大族”通行无阻的势力在首都之外进

一步衰落。而当宋代统一南北之后，范围更加扩大的科举制和朝廷奖掖士学的其他方式，使那些富贵之人有理由去获得与士族传统联系在一起

的文化成就，以此作为一个手段来维护他们在宋王国里合法的政治权力。在这个转型期，的确有社会流动，就像在动乱的时期经常出现的那样

。从十一世纪中期开始，政府的政策就试图为地方豪强参与精英文化提供制度上的手段。然而这并没有带来一个“平民”希望掌握政治权力的

社会。科举制度是为“士”提供的。这包括那些来自非官僚家族的人，他们被同侪看作士。换句话说，士作为宋朝的国家精英，不是一个从法

律上界定的群体，而是一个从社会角度界定的群体：士是那些被所有其他的士说成是士的人。很显然，在北宋末年，士人在判断一个人是不是

士的时候，并不过多地依据家族背景，而是依据他的教育状况。

科举制在北宋的扩大，鼓励人们接受文官所需的教育，以此得到权力，这种扩大并没有导致恩荫特权的废除，这种特权允许官员为子孙谋取官

位。正像John Chaffee所表明的，随着教育制度持续扩大，应考者不断增加，官僚家族不断创造一些制度来使他们的亲属更容易及第。<sup>(12)</sup>尽管

如此，被认可为一个“士”的重要意义，还是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科举教育，参加科举。<sup>(13)</sup>

千千万万的人接受科举教育，这个人数代表了士的总数，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士的总数远远超过了官员的总数。因此，即使我们承认

官员拥有比别人更大的权力和特权，他们仍然是他们所属的士这个更大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当像Robert Hartwell和Robert Hymes这样的社

会历史学家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观察社会，他们的个案研究表明，到十二世纪末，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中国南方地区，是

由自我赅续(self-perpetuating)的地方精英所支配。这些家族只是偶尔产生一些官员，但是由于人数不断膨胀，他们得以维持其财产的能力一

直在削弱。<sup>[14]</sup>这些家族实际拥有多少土地，我们所知甚少，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他们在扩大职业选择、开发商业上的机会，并且自己确认为“士

”这个群体的成员，而“士”这个概念传统上是指受国家认可的精英。我们对他们在地方文化、社会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了解得更多。他们几

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适应科举的文学教育，即使当他们在观念上反对这种教育时，也是如此。他们对地方学校投资，控制了入学的机会；带头

修建和布施地方的佛寺、道观以及地方祭祀的庙宇。他们参与、有时则是领导着私人组建的自卫队伍，在征税和组织劳役中扮演领导的角色，

在饥荒的赈济中做主要的贡献，用法律来解决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的争端。<sup>[15]</sup>他们对家族组织的改革有各种各样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是促

进后代子孙延续家声，提高社会道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根据家族的理想来修正性别角色。<sup>[16]</sup>这不是一幅平民崛起的社会画面，而是关

于一个精英阶层的描述，这个阶层基于地方，组成这一阶层的家族在想办法使自己不至于在社会流动中中落，这种中落来自不能代代为官、以

及祖业被分割的压力。

在经济史方面，传统的意见认为，宋代的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看法已被普遍接受，还很少有人提出挑战。地方精英的存在当然一

定与此有关，因为没有更大的财富，就很难支撑地方精英家族持续不断的发展。Richard Von Glahn)曾经言之凿凿地认为，私人市场是经济增

长最终的动力。<sup>[17]</sup>正像Paul Smith所指出的，在十一世纪晚期，国家的“官僚资本家”以一种刺激经济越来越活跃的方式来利用国家制度，即

使他们的剥削最终对私人经济是一种毁灭。<sup>[18]</sup>Hi Zh Clark对福建的研究表明，在宋代对外贸易已经能够帮助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sup>[19]</sup>

在政治史方面，学术研究已经从对皇权独裁的研究，转向关注十二世纪更重要的“制度”发展：十一世纪的偶像是在政府中积极有为、热衷干

预世事的人，他们一方面寻求从物质上、社会上和文化上改变社会，一方面增长国家的“财富与权力”，在十二世纪这种偶像遭到排斥。<sup>[20]</sup>这

是由于与王安石联系在一起的积极有为的政府其为政之道的失败，以及替代国家激进主义的种种做法的出现，这些做法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21]近来关于官僚制、法律制度和对外关系的研究，没有提供任何佐证来证明唐宋转型是独裁统治的结果。[22]宋代君主与官僚之间的距离比

唐代要大，但皇帝更加孤立也是事实。实际上，权力经常被宰相所掌握。[23]

宋代留给后代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相对于人口的增长，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变小了，与唐代政府在土地、劳力和贸易等方面所拥有的权力

相比，它的权力变弱了。晚期的中华帝国是以“小国家”为标志的，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的，是强大的地方精英的存在，他们保持着与政治秩

序的文化联系。从长远来看，中央政府不能取消地方精英所处的中介立场，他们处在从事生产的平民和地方上中央任命的权威之间。在南宋，

要臣(Leading officials)鼓励地方的士人(即精英分子)成为负责地方社区之社会与道德状况的领袖。地方的精英家族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地

方政务非正式的参与合法化，他们篡夺了地方政府的特权，或填补了有为的政府在退缩后留下的空间。到十二世纪末，那些最热心建立一个理

想社会的人，不再确信单单靠政府能实现这个理想。[24]

注释

⑨ 我提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和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我这样说，也许要把他们放到一个自己不可接受的环境中。伊懋可认为在中世的革命之后(十四世纪未完

成)，出现了停滞，他把这种停滞归因于新儒家从思想上阻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制度不能保护剩余价值(这反过来与技术的状态有关)。

而黄仁宇揭示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制度如何能够维持王朝的运行，但认为它不能产生为现代性所必需的制度，诸如像解决国内争端所需的法律制

度。当然有更多的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西方比其他地区更富强。最近的一些例子包括：Alfred w. Crosby, 《现实性的尺

度：量化与1250—1600年的西方社会》(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1600,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 L Jones, 《重现的增长：世界历史中的经济变化》(Growth Recurring

; 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David S. Landes,

《及时的革命：里程碑和通往现代社会之路》(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以及《国家的财富与贫穷：为什么有些如此富裕，有些如此贫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Are so Poor, 1st ed. ,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Douglass Cecil North

和 Robert Paul joint author Thomas,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部新的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 1973); 以及 Andre Gunder Frank, 《重新定位：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Calif

.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⑩ 关于世家大族用文化来界定自己的看法，见伊霏霞《中华帝国早期的门阀家族：博陵崔氏个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 of Eart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 David Johnson, 《一个世家大族的最后岁月：晚唐宋初的赵郡李氏研究》("The L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 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 ), 见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37卷第1期(1977), 第5—102

页。

(2) 例如，见 John Chaffee 在《中国宋代学术的荆棘之门：科举的社会史》(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一书对公平性的丧失的讨论。与那些为地方精英的支配作用做

辩护的人不同的是，John Chaffee 至少是把教育体制看作是向有才之士相对开放，因此是一个向上的社会流动手段。关于教育体制和相关的问

题，见 Thomas H. C. Lee, 《中国宋代的政府教育和科举制度》(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the Examination System in Sung China,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5)。

(3) 我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尽管科举及第的成功机会锐减，接受科举教育的人数还是在增长，这表明家族在试图保持他们作为士的社会身份。

见包弼德《科举制和士》(Peter K. Bol,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Shih,"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3. 2[1990])。

(4) 对从唐代，经过北宋，一直到十二世纪的南宋出现新的社会秩序这一转型，最有影响的描述是 Robert M. Hartwell《750—1550年中国人口、

政治和社会的转变》("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此文见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

42卷第2期(1982), 第365—442页，以及《政治家与君子：南北宋福州、江西的精英》(Statesma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关于家族的规模，见 John Chaffee, 《地

位、家族和地域：中国宋代科举名单的分析》(Status, Family and Locale: Analysis of Examination Lists from Sung China)。见衣川强编

：《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 Dohoshal 1989), 第341—356页。关于一个成功的精英家族的更传统的描述，见 Richard L

Davis, 《中国宋代(960—1227年)的朝廷与家族: 明州士人的仕途成功和裙带资源》(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27;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of the Shih of Ming-chou, Chapel Hil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 这总结了到目前为止对地方精英的活动的最重要的描述: Robert Hymes, 《政治家与君子: 南北宋时期的福州、江西精英》。请注意, Hymes

是根据一个人的活动和他的亲属关系来界定他是否属于地方精英, 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感觉。然而他注意到那些发挥着地方精英之作用的家族

, 仍然自称为“士”。一部更晚近出版的著作比较了宋代宰相的家族与地方精英的活动, 这就是Beverley Bossler《权力的关系: 中国宋代

(960—1279年)的亲属关系、地位和国家》(Relations of Power: 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97)。

(16) 关于家族的组织方法, 见伊霏霞: 《中国宋代的家族与财产: 袁采对社会生活的训诫》(Family and Property in Sung China: Yuan

Ts'ai's Precepts for Social Prud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华帝国的儒家思想与家族礼制: 关于礼制文献的

社会史研究》(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s about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内闾: 中国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Inner Quarters: Marriages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ong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以及伊霏霞和Jaliles L. Watson编辑的《中华帝国晚期的

亲属组织: 1000—1940年》(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7) Richard von Glahn, 《财富的源泉: 中国1000—1700年的货币和货币政策》(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8) Paul Smith, 《征税于天府之国: 1074—1224年马匹、官僚和四川茶业的衰落》(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Horses, Bureaucra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4—1224,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19) Hugh Clark, 《社区、贸易和组织: 三到十三世纪南方的福建省》(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关于知识分子对什么是政府恰当的角色争论，见包弼德：《政府、社会和国家：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蓝图》(Government, Society, and State: On the Political Visions of Ssu-ma Kuang and Wang An-shih); 以及 Conrad Schirokauer 和 Robert Hymes, 《燮理天下：宋代对政府和政策的讨论》(Ordering the World. Discourses on Government and Policy During the Su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第

128 - 192页中的其他文章。关于新法政府中的地区、文化扩张主义者和激进的经济政策，见Paul Smith《征税于天府之国：1074—1224年马匹

、官僚和四川茶业的衰落》以及Richard von Glahn《千流万壑之国：宋代四川前线的扩张、定居和开化》(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Expansion, 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21] 体现这一潮流的最好的例子是由Conrad Schirokauer, 和Robert Hymes编辑的《燮理天下：中国宋代通向国家和社会的道路》。

[22] 例如，见winston w. Lo, 《中国宋代文官考试制度介绍：以人事管理为中心》(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Sung China: With Emphasis on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 Brian McKnight, 《中

国宋代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 in Su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以及 Jing-shen Tao, 《天

子：宋辽关系研究》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 - Liao Relation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 。 还请注意 Morris Rossabi

所编辑的《势均力敌中的中国》(China Among Equa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23] 刘子健(James T. C. Liu)早期的研究认为宋代兴起了独裁，但在他最后一本书中，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官员，他把官员看作是帝国独裁权

威的“代理者”；见刘子健：《趋于内向的中国：十二世纪早期的思想——政治变化》(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24] 对宋代政治思想和实践中反复出现反对派，以及南北宋之间的转型，Conrad Schirokauer, 和Robert Hymes编辑的《燮理天下：中国宋代

通向国家和社会的道路》对此有一个讨论。此外，尤其对新儒家在这个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见Wm. Theodore de Bary和John Chaffec编辑的

《新儒家教育：初始阶段》(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刘宁译)

- 上一条：[古迹亲历之一：尉氏县北宋兴国寺塔](#)  (9-4)
- 下一条：[靖康内讧解析](#) (9-7)

相关专题： <a href="#">无</a>	相关信息： <a href="#">唐</a> <a href="#">宋</a> <a href="#">转型</a> <a href="#">思想</a>
尚无信息	尚无信息

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s 错误 '80040e21'

ODBC 驱动程序不支持所需的属性。